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Crises
in Tianjin*

from 1900 to 1928

1900—1928年

天津金融风潮研究

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

郝志景 /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助出版

*Research on
the Financial Crises
in Tianjin*

from 1900 to 1928

1900—1928年
天津金融风潮研究

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

郝志景 /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郝志景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6
ISBN 978-7-309-14291-4

I. ①1… II. ①郝… III. ①金融-经济史-天津-1900-1928 IV. ①F83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3228号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以货币发行为分析中心
郝志景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211千
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4291-4/F·2559
定价：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选题很有意义。天津在近代开埠后，内外贸易及金融、工业、交通等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口岸城市。随着近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天津金融风潮迭起。这些风潮有的是受全国性金融风潮影响，也有的是地方因素造成的。以往的研究重视前者忽略后者。因此，郝志景的这一选题研究不仅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也有深入认识中国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性的现实借鉴意义。

郝志景对相关重要资料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整理，特别是对天津市档案馆的原始材料、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与资料等，下了很大功夫。他以丰富的史料为支撑，全面而细致地揭示了1900—1928年间天津所发生的多次金融风潮轨迹，并对当时天津政府及若干中间组织以及市场主体的反映与应对做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他把杂乱的近代天津货币金融史料整理成清晰可信的历史演变线索，体现了他较高的驾驭史料功力。

郝志景注重历史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相结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借鉴哈耶克有关竞争性自由货币的理论探讨，从货币发行角度阐述天津的近代金融风潮，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理论性与学理性。他认为，统观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的六次金融风潮，两次直接责任在于民间，四次直接责任在于政府。发行货币可以获得铸币收益，而无论民间发行还是政府发行，如无有效机制制约，都易导致滥发，酿成危机。哈耶克认为民间发行货币，可以建立有效机制，防止货币滥发。这种机制就是货币竞争。在竞争环境下，货币之间没有固定比价，劣币不能驱逐良币，反被良币驱逐。如若政府强定货币比价，货币无法自由竞争；“格雷欣法则”就会发生作用。近代天津的货币

危机,与哈耶克所论者存在某些相通之处。他结合近代天津竞争性自由货币制度自发演进的独特历史,对竞争性自由货币制度理论进行验证,考察其约束条件与演进变化。他注重近代天津竞争性自由货币体制下的金融风潮与国家垄断货币制度下金融波动的不同呈现,丰富了对金融危机的经济解释,具有原创性贡献。

郝志景认为,近代金融行业需要中间组织,以之制定行业规则,维护行业利益。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商会、钱商公会和银行公会先后在津成立。在应对历次金融风潮时,三个公会组织都曾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应对金融风潮,近代天津官方、商会、钱业公会、银行公会等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由于近代政府对于货币的主导权日益增强,政府往往贪图铸币利益,民间难以制约政府,导致天津应对风潮的很多工作效果不佳。他指出,清末和北洋时期中国远未实现民主法治。比之哈耶克所批判的政府行为,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做法,更是等而下之。国家实现民主法治以后,政府控制货币尚且问题丛生;如若还未实现,而政府又对货币具有无限权力,岂不更加令人担忧?郝志景的分析视角独到,思路清晰,论证充分,体现了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可贵品格。

郝志景既有在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的经历,又有在著名高校任教的经验,而《1900—1928年天津金融风潮研究》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希望他继续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做出更好的成绩。

陈争平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选题缘由	1
二、学术史回顾	3
(一) 关于清末与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发展	3
(二) 关于近代中国币制的相关问题	14
(三) 关于近代天津金融和中国币制的史料整理	22
(四) 关于相关货币理论	25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31
四、论文结构	32
第二章 近代天津金融概况	34
一、近代天津的银号与银行	34
(一) 近代天津的银号	35
(二) 近代天津的本国银行	38
(三) 近代天津的外商银行	43
二、天津金融发展中的三大组织	45
(一) 天津商会	46
(二) 天津钱商公会	49
(三) 天津银行公会	52
三、近代天津的主要货币	54
(一) 主要金属货币	54
(二) 主要纸币	58
四、小结	65

第三章 清末天津的金融风潮及相关应对	66
一、贴水风潮	66
(一) 贴水风潮缘起及其危害	67
(二) 官、商应对与银号变革	73
二、铜元危机	82
(一) 津埠铜元危机之起	83
(二) 应对铜元危机的举措与思路	89
三、银色风潮	98
(一) 风潮之起与华洋交涉	99
(二) 天津公估局的设立	103
四、小结	108
第四章 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风潮及相关应对	112
一、两次中交停兑风潮	112
(一) 风潮之起与津市慌乱	113
(二) 停兑风潮的应对	123
二、省钞挤兑风潮	131
(一) 省钞挤兑风潮之起	132
(二) 风潮的应对	137
三、铜元与铜元票危机	145
(一) 铜元涨价危机	146
(二) 铜元贬值危机与铜元票停兑	153
四、小结	162
第五章 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金融风潮的理论分析	165
一、清末与北洋时期政府货币主导权的增强	165
二、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金融风潮中的金属货币与纸币	171
(一) 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金融风潮中的金属货币	171
(二) 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金融风潮中的纸币	182

结束语	195
一、关于 1900—1928 年天津金融风潮的总结	195
二、关于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探讨	199
附 录 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的部分货币	202
参考文献	214
后 记	224

第一章 绪 论

一、选题缘由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金融活动源远流长。时间愈晚,作用愈大。如把经济发展比作躯体运转,金融活动就是血液循环。躯体健康与否,血液循环关系极重。金融日益重要,若其发展遭遇重挫,常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这种重挫的主要表现,就是金融危机,或曰金融风潮。金融风潮发生之时,一地或者多地的金融指标,迅速恶化;金融组织和其他企业大量倒闭,经济萧条,甚至政治也会动荡不安。17世纪以来,欧美各地的重大金融危机,主要包括郁金香狂热、约翰·劳计划、南海泡沫、佛罗里达土地投机、大萧条时期的股灾、1987年美国股灾等等^①。这些危机有大有小。影响所及,或者限于一地,或者跨洲越洋。最近二十年,世界经济渐成一体。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弥漫全球,各国几乎均难置身事外。金融风潮一再发生,破坏巨大。人们自会深思:什么原因导致金融风潮?应该如何应对?古往今来,很多学人对此研精覃思,各种解释不计其数。

一般而言,金融风潮可分三种类型:一是资本市场危机,如股市大跌;二是金融机构危机,如银行倒闭;三是货币市场危机,如货币贬值。三类危机往往互有影响,彼此牵连。三类危机之中,货币危机产

^① 从1634年开始,荷兰人疯狂抢购郁金香。郁金香球茎价格猛长。1637年,球茎价格暴跌,投机者大量破产。史称“郁金香狂热”。约翰·劳是英国金融家。18世纪初,他成立密西西比公司,谎称有权开采路易斯安那的金矿,在法国销售公司股票。法国人疯狂购买,股价大涨。最后真相大白,股价大落,破产者众。史称“约翰·劳计划”。18世纪初,英国南海公司将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垄断,股价大涨。最后公司股价大跌,大批地主、商人因为购其股票而破产。史称“南海泡沫”。佛罗里达气候宜人,适合度假。20世纪20年代,很多人对其进行土地投机。1926年,佛罗里达迭遭飓风袭击。投机者纷纷抛售土地,泡沫破灭。史称“佛罗里达土地投机”。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股市暴跌22.6%。史称“黑色星期一”。见王福重:《金融的解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63—366页。

生最早。解释货币危机,需要涉及各种货币理论。这些理论多会探讨如下问题:何种币制可以充分发挥货币职能,规避货币危机,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对此问题,各种金融学说恰似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目不暇接。简而言之,这些学说大体可分两类:一类认为货币应由国家垄断,由其遵循某种原则,确定货币供应量;一类认为货币不应垄断,而应多元发行,自由竞争。近代以来,欧美各国的货币发行,多被国家垄断。学人探讨货币危机,自以货币统一为其前提。在此前提之下,各骋奇思,异说竞起。这些学说都属第一类,洵为洋洋大观。与之相比,第二类学说屈指可数,唯有哈耶克(Hayek)和劳伦斯·H.怀特(Lawrence H. White)等人作此主张。其中哈耶克名气尤大。哈耶克反对统一货币,强调货币应该多元发行,唯其如此,方可避免货币危机。其时欧美各国多已统一货币,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发行,上述理论无法印证。其是非曲直、优劣得失,后人很难评判。最后哈耶克本人面对现实,也是心灰意冷,认为自由货币难以实施^①。

与欧美各国的货币状况不同,中国在很长历史时期,货币并不统一。铸币权由政府 and 民间分享。政府所铸货币仅为一端,其影响视所占比例而定。所占比例愈高,影响愈大;所占比例愈低,影响愈小。政府货币与民间货币互相竞争,这是中国货币史的常态,在世界上别具一格^②。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可从中国货币史得到某种印证。哈耶克所提的自由货币,是不兑现货币。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纸币,多是可兑现货币。此处两者存在不同。不过他的货币竞争、多元发行等观点,确实能为我们思考中国传统币制带来启发。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货币体制也在逐步变化。铸币权由官民分享转向政府垄断。清末与北洋时期,这种转变已经开始。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这种转变最终完成。至此,一种新的货币形态,宛然成型,以至于今。国家垄断货币发行,这是近代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中国同样循此潮流,追随而去。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币制多被斥为混乱无序、极度落后。这种混乱落后有无某些

^① 富景筠:《货币与权力——读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读书》2008年第4期,第127页。

^②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序言13、14页。

合理因素?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巨变?已往研究对此虽有涉及;而其扑朔迷离、别有洞天之处,依然人迹罕至^①。

货币是金融的核心,货币理论深不可测。如能选取一个城市,结合哈耶克的理论,对这些问题变换角度,反复审视,则有希望在货币理论中寻幽探胜,一观江海之大、鱼龙之奇。本书基于上述想法,选取天津进行实证研究。天津在清末与北洋时期,金融风潮接二连三。这些风潮大多属于货币危机。危机的直接责任,或在民间,或在政府。无论民间多元发行货币,还是政府主导发行货币,均难杜绝危机。我们自然心生疑问:上述两种发行方式,孰优孰劣?当今世界,金融危机依然阴霾不散。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一旦危机爆发,很难独善其身。此时回顾传统,深入研究近代天津的金融风潮,观其起源流变,察其官民应对,可使后人深入理解两种发行方式的利弊得失,重新评估传统币制的某些特质。这对今人探索最优货币体制、规避某些金融危机,无疑启迪深长。

二、学术史回顾

结合哈耶克之论研究近代天津金融风潮,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一是清末与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发展,二是近代中国币制的相关问题,三是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及其争论。这些领域或是新创园地,尚待细细耕耘;或是开发已久,早有老树浓荫。探讨近代天津的金融风潮,首先应对各个领域的相关研究做一回顾。此外,关于近代天津金融和中国币制的史料整理,是本书的研究基础,在此亦需略作回顾。

(一) 关于清末与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发展

研究清末与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发展,属于区域金融史范畴。金融史是近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区域金融史为其一端,唯其研

^① 张五常目光如炬,曾经一语指出:“哈耶克在生时极力主张的自由银行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题材,中国的学者竟然忽略了。”见张五常:《货币战略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研究对象极不均匀。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其金融实力高出群伦,一骑绝尘。故对上海近代金融的研究,从民国以至今日,层出不穷,日积月累,寔成巨观。比之上海,关于近代天津金融的研究,却是瞠乎其后,远远不及。对其金融风潮的系统研究,更是冷冷清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论者开始研究天津金融。他们或做实地调查,或做历史总结,陆续写出若干文章和专著。1928年,淑仪撰文^①,指出天津金融业弱点有四:一、放贷偏重感情,过于信任个人,对于借款者的实际状况却不重视。一旦银号^②意外亏耗,无法支持信用,全市金融常被牵累。二、狃于故习,惰性较深,不能容纳新的意见。三、一切计算偏于琐细,忽视远大,常因贪图小利而受重大损失。四、同业之间,过于散漫。除了例设公会,几乎没有合办机关和互助事业。领袖行号也无控驭能力和牺牲精神,不能领袖群伦。淑仪结合协和贸易公司倒闭风潮、外国银行华账房倒账危机、银号拨码漏洞、少数“跑合”操纵津沪汇价等具体事例,说明上述缺点,建议天津金融行业与时俱进,不再迷信个人信用,遇到重大事项,破除成见,互相协作。北洋时期,天津金融风潮频发。淑仪有感于此,振笔为文,重在指出天津金融的种种不足,对其发展则略而不写。

1929年,《工商半月刊》刊发《天津钱业之调查》^③。该文对天津钱业的历史、内部组织、各类业务、账目管理、钱商公会详细总结。近代天津的货币危机,该文已有论及。文中提到:天津钱业大小各号皆发钱帖,流通本地,种类繁多。常有钱号发帖过多,准备不足,最后周转不灵,以至倒闭。倒闭者多,往往酿成金融风潮。洋元兴起之后,钱帖渐废。大小各号又发洋元钞票。而通行日久,重蹈覆辙。天津商会针对此弊,召集钱商开会,议定各号如若倒闭,所有财产应先用于收回钞票,其次用于偿还同业川换,最后才能清理其他债务。

1930年,《杨著中国金融论》出版^④。该书专辟一章,论述近代天津金融市场的沿革、银号、本国银行、外国银行、金融界的团结、通货

① 淑仪:《天津内国金融业之观察》,《银行周报》1928年第12卷第3期。

② 天津钱业名称不一,如钱铺、钱庄、钱局、钱号等,都是钱业组织。民国初年,这些组织大都改称“银号”。本书在行文过程中,根据时人称谓,或用“钱庄”,或用“银号”,并无严格区分。

③ 《天津钱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12期。

④ 杨荫溥:《中国金融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及其行市、票据及其清算、金融行市的涨落等。杨荫溥认为近代中国币制绝无条理,两元并用,辅币紊乱,纸币复杂。这与国外大不相同。处于这种币制之下,天津金融风潮迭起。杨氏对天津金融界的团结非常推崇,曾从三个方面论述:天津各个银号的团结、银行界的团结以及金融界的合作。杨氏论各个银号的团结,重在银号同业维护、电汇与银元等各项行市的设置、同业争执的调解三点;论银行界的团结,重在银行公会联络同业一点;论金融界的合作,重在银号与同业或银行的靠家关系、银钱两业互相合作的公约、金融维持会的设立、金融恐慌之中准备金的筹设四点。1931年,吴本景也撰文叙述天津的金融状况^①。其时天津各行发钞有多有少,流通区域亦广狭不同。吴氏指出这一重要现象,并对各行发钞数额及其流通区域进行估计。此外,吴氏对天津本地硬币的行使情形、银行银号当店的状况、华商银行、银号与外商银行的主营业务、本地金融市价情形、需要现金的季节性、老头票的大略情形、华商银行公会、洋商银行、钱业公会等内容也有总结。大体而言,吴氏之文平铺直叙,对于某些重要现象的前因后果,缺少深入分析。

1931年、1933年和1934年,何育禧、王培和中央银行分别调查天津金融,并且发表相关调研文章^②。清末和北洋时期,各地银两的重量标准,千差万别。何氏将天津与上海、北平、济南、开封、奉天、营口、成都等地的平码兑换比率详细列出。王氏对天津银号与银行资本的调查尤其详尽。基于这些调查,王氏整体评价天津金融,指出天津金融劣于上海,但是优于国内其他各埠,较少惊风骇浪。国民政府初期,尤称稳定。唯就天津银号而言,资本微弱,规模狭小,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至于银行,则是均将资金投入商业,分类徒有虚名,垦务、农工缺少援助。王氏认为这是天津金融的不足。中央银行的调查,没有评价天津金融,而是对其金融市场、金融机关、资金实力、票据与货币概况客观叙述。该文论及铜元和银币时,指出津埠工资与物价多以银元标价,但有若干行业和物品仍以铜元标价。某些银币在天津行使,需要贴水。这些货币现象非常重要,发人深省。总之,

^① 吴本景:《天津之金融状况与商业情形》,《中央银行旬刊》1931年第3卷第17—19期。

^② 何育禧:《天津金融概略》,《钱业月报》1931年第11卷第1期。王培:《天津金融市场之调查》,《实业金融》1933年第2卷第2期。

上述三种调查均在国民政府初期,从中能够推知北洋时期天津金融的某些状况。若干数据更是非常珍贵。后人基于这些数据,可以适度进行量化研究。

1935年,吴石城围绕天津金融业与金融市场,发表系列文章^①。这些文章对近代天津的金融状况做了系统介绍。关于天津的货币流通,吴氏主要介绍银两、银元、辅币和纸币。介绍辅币之时,吴氏曾论述及铜元贬值危机,论其原因与影响,并且提出补救办法。介绍纸币之时,吴氏指出,天津纸币因其发行银行不同,流通范围大小有别。纸币挤兑风潮频发,吴氏对此也曾论及。不过对于上述现象,吴氏所论均是蜻蜓点水,没有展开。吴氏与杨荫溥相同,也很重视天津金融界的团结,故而专文论述。其文主要围绕银号之间、华商银行之间以及银钱两业之间的团结,视角与杨氏相似。

1936年,王子建、赵履谦调查天津银号,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演变深入探讨^②。其内容主要包括:天津银号的沿革、派别、现状、主营业务、组织与管理、钱业公共组织、银号与外界的联系。两人认为银号资本小于银行,清末为其颠沛时期,民国建立之后,则是挣扎图存时期,尽管如此,银号仍能继续发展。二人将其原因归为三点:一是天津为北方经济中心,金融需求巨大,单靠银行供不应求。二是银行贷款侧重抵押,不重人情,而银号则多开展信用放款,更加符合商业习惯。三是银号财东负有无限责任,经营管理,颇有特长。凡此诸端,均使银号处身激烈竞争之中,终能岿然不倒。

总体言之,对近代天津金融业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刚刚起步。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天津银号、银行、货币状况、公会组织、金融季节等问题。或是整体观察,面面俱到;或是选择专题,论其一点。某些研究已经涉及金融风潮,不过都未将其拈出,专门研究,深入分析。近代天津的金融风潮,很多都是货币危机。上述研究论及天津货币问题时,也都很少结合整个国家的货币体制。就行文风格而言,

^① 吴石城:《天津之货币流通概况》,《银行周报》1935年第2、5期;《天津之银号》,《银行周报》1935年第16期;《天津之华商银行》,《银行周报》1935年第19期;《天津之外商银行》,《银行周报》1935年第29期;《天津金融业之团结》,《银行周报》1935年第32期;《天津典当业之研究》,《银行周报》1935年第36期;《天津之票据与其清算》,《银行周报》1935年第38期;《天津金融季节之研究》,《银行周报》1935年第42期;《天津之平民金融组织》,《银行周报》1935年第46期。

^② 王子建、赵履谦:《天津之银号》,永兴洋纸行,1940年。

上述研究多是客观叙述,较少主观评论。能用经济理论分析各种金融现象,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相互结合者,更不多见。虽然如此,上述研究对于近代天津金融的很多方面如实记载,留下大量材料和数据。这些材料和数据弥足珍贵。后人只有基于这些记载,才能继续深入分析,探讨前因后果,对于很多现象提出解释。

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中,政治变动接连不断。这段时期,很少有人研究近代天津金融,形成学术史上的一个空白。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研究从无到有,渐渐增长。唯就近代天津的金融地位而言,研究成果远不相称。1979年,陈宗彝回顾了建国之前天津金融市场的变迁^①。陈氏于1917年开始在天津钱业工作,前后三十余年,历任多种职务,对其十分了解。关于清末与北洋时期天津的金融市场,陈氏主要叙述各种货币交易、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以及日本人操纵天津金融市场的若干活动。陈氏论津市货币交易,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庚子之前的货币流通和钱局活动、庚子之后钱业的变化、跑合铺^②的出现、钱商公会成为金融市场中心、“五四”运动对老头票的冲击、华俄道胜银行地下室的羌帖市场。很多金融活动和金融业务,陈氏都是亲历者,耳闻目见,素稔其事,故而总结比较细致。

20世纪80年代初,杨固之、谈在唐、张章翔发表长文,总结天津钱业发展史^③。该文所涉时段很长,从乾隆年间天津钱业发轫谈起,直到1952年天津钱业清理为止,中间共有几百年。三人认为天津钱业共有四种类型:钱庄、票号、汇兑庄与银钱兑换号。汇兑庄是外地钱庄的驻津机构,办理解付汇票和申汇事务。银钱兑换号专门经营各种货币兑换业务。每种类型钱业的起源、演变与消亡,该文均有概述。该文指出庚子事变之后,天津钱业变革很多,诸如天津官银号创立、钱庄改进经营方式、与洋商银行华账房建立关系等,俱是新兴之事。北洋时期,天津钱庄快速发展。该文对其帮派、资本来源、主营

^① 陈宗彝:《解放前天津金融市场的变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跑合铺就是说合货币交易的中间机构。庚子之前,天津银行和工商户买卖银元,均是委托银号代办,银号再委托跑合人相互交易,取得平衡。庚子之后,某些跑合人组织跑合铺,以买卖银元和羌帖为主要业务。

^③ 杨固之、谈在唐、张章翔:《天津钱业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业务、经营管理、与商业银行的关系等问题详细总结。

同一时期,刘嘉琛也对天津钱业进行了总结^①。刘氏从资本来源、帮派背景与经营特点三个方面入手,指出投资天津钱业者主要来自盐商资本、一般商业资本、地主资本、银行界资本、高利贷资本与军政界资本。天津钱业的帮派,主要包括天津帮、北京帮和山西帮。按照经营特点,钱业分为西街银号、东街银号与租界银号。1987年,刘氏又与谢鹤声共同撰文,回顾近代天津的货币演变^②。两人指出:民国建立以后,多种货币流通津市。特别是各种银行兑换券,五花八门,最为混乱。发钞银行既有国家银行,又有私营银行;既有中国银行,又有外国银行。不过两人对此没有分析评论,仅是指出这一现象。此外,天津钱业实施拨码制度四十余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天津票据交换所成立,拨码制度方告终结。这种制度的定义、产生、内容以及具体运作,两人也有回顾^③。

1987年,英夫、朱继珊撰文论述天津钱业和钱业同业公会^④。两人指出满清入关两百余年,一直沿用明朝白银与制钱,并无统一的货币制度。因此,当时货币兑换非常频繁。经营此类业务的机构,称为“兑钱摊”。此即天津钱业之始。此后,经济日益发展,金属货币使用不便,“银帖”、“钱帖”等纸币遂应需而出。迨外国势力东来,金镑、美金、法郎、马克、卢布、日元等外国货币又先后流入天津。市面货币愈为复杂,兑换业务愈为发达。尽管如此,天津钱业却很分散,机构名称不一,经营多样,行业情况极其复杂。英、朱二人指出民国成立之后,钱业经营方趋正规,公会组织也日益重要。关于天津钱业公会的沿革、章程、人员组织,特别是清末与北洋时期公会的主要活动,诸如规定元宝含银量、设立公估局、制定申汇交易规则、规复旧章开议各项行市、制定银条银帖与铜元票的发行规则、整顿纸票、应对危机接济市面等等,英、朱二人详细介绍。

^① 刘嘉琛:《解放前天津钱业述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谢鹤声、刘嘉琛:《天津近代货币演变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 刘嘉琛、谢鹤声:《浅谈天津钱业的拨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④ 英夫、朱继珊:《天津钱业和钱业同业公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工商史料丛刊(第7辑)》,1987年。

1988年,沈大年主编《天津金融简史》^①。该书论述天津金融,重在建国以后的四十年。关于清末与北洋时期的发展情况,只在第一章简要介绍。天津早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指钱铺、票号和典当业。清末民初,这些机构有兴有衰。天津银号与本地工商业联系密切,社会基础深厚,又从中外银行获得资金支持,故在民初发展迅速。外国银行财力雄厚,控制天津外汇市场,掌握天津海关和国库,兜揽存款、掠夺资金、发行纸币、扰乱金融。该书对于上述内容均有总结。清末与北洋时期,国人在津自办银行,发展颇快。该书认为,当时银行与产业发展关联不大,本国银行一时兴盛,主要缘于三个原因:一是官僚、军阀与地主大量来津,投资银行;二是工商萧条、农业不振,富人为保安全,多将资金存入银行;三是银行投机公债,大获其利。总之,建国以前,天津金融存在很多问题。该书对此重点论述。不过该书同时肯定,天津金融也有优点,比如金融机构众多、活动范围广阔、货币资金集中、调拨使用灵活、管理经验丰富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和建国之前有些相似,主要就是叙述近代天津金融的方方面面,包括货币、钱业经营、钱业公会、钱业与银行等。能够选择专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者不多。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1993年,《近代天津城市史》出版^②。该书是一部天津通史,对数千年间天津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均有总结。天津开埠之后,商业发展迅速。该书指出商业发展需要货币调节,与信用活动密切相关,了解一个地方商业贸易的发达程度,可从该地金融见微知著。天津早期的金融组织,主要就是钱铺和票号。清末外国银行络绎来津,开设分行。国人也起而模仿,现代银行由此兴起。这些都与商贸发展有关。20世纪初期,天津贸易和金融业发展尤速,对腹地影响日大。该书对此深入探析,其内容包括商业的近代化倾向、商业规模的扩大、促使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诸多因素、天津与腹地商品联系的发展、银行业的兴盛、银行业务范围的确立、旧式钱业的转变、天津与腹地的金融联系等。这种分析重视天津经济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在此背景之下观察天津金融,特别强调金融发展与贸易消长的密切联系,视野开阔,立论平实。

^① 沈大年编:《天津金融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